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訪談沙斯琦雅·莎珊

An Interview with Saskia Sassen

doi:10.30008/CD.200303.0004

城市與設計學報, (13&14), 2003

Cities and Design, (13&14), 2003

作者/Author：夏鑄九(Chu-Joe Hsia);葉蔭聰(Iam-Chong Ip);劉益誠(I-Chan Liu)

頁數/Page：41-49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3/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008/CD.200303.0004>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城市與設計學報
第十三/十四期 2003 年 3 月
Cities and Design
No.13/14, March 2003

訪談沙斯琦雅・莎珊*

夏鑄九、葉蔭聰、劉益誠訪問**

葉蔭聰翻譯整理

An interview with Saskia Sassen*

by

Hsia, Chu-Joe & Ip, Lam-Chong & Liu, I-Chan

Translated and compiled

by

Ip, Lam-Chong

* 收作日期：2001 年 11 月 9 日；Received: November, 9, 2001.

** 夏鑄九為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葉蔭聰與劉益誠是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生。



問：妳說過妳是一位移民，並曾當過清潔工人，我們對妳的背景很感興趣，妳的成長背景與妳的研究興趣及角度有甚麼關係？

莎：你說得對，我當初到美國時是一個非法移民，我第一份工作是清潔工，但我要補充，我的家庭也不算是窮等人家，但我從小對貧窮問題便十分關注。九歲時我住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貧民區，那裡有一場很嚴重的水災，我把衣服放在一個大行李袋裡便逃出來；當我來到美國，我對移民問題仍然相當關心，我與很多移民一起工作，與一些朋友一起組織移民，保護移民權利；我拿到的第一份獎學金，本來給我作為博士論文研究之用的，我卻拿來設立了一家移民勞工子女的日間托兒所，我的論文是有關移民勞工、黑人及政治經濟學，我還記得，我的教授不批准我的研究計劃書，他是經濟社會學家，他不喜歡我這樣的題目。

問：妳的研究大概可以被歸類為政治經濟學，據我所知，在這個領域中女性較少，妳認為這對這個領域是否有特別意義？

莎：在美國學術界，如果你告訴別人，你是研究政治經濟學，便等於把自己形容為或多或少是個馬克思主義者，這就是為何我稱自己為政治經濟學者的原因，而且我對經濟與國家之間的交匯點非常感興趣。我視我的身份是一個女性及外來者，我說英語時，大部份美國人還是可以辨認出我不是美國人，我不是那種在美國土生土長的人。剛來美國生活時，我會自視為一個外來者。在學術圈中，我不太關心有沒有特權或優勢，不過我必需承認，我在學術界已有一定地位及名氣，不斷有大學聘請我去教書，但這些只是讓我能做我想做的事情，我要研究的是我們的社會系統如何運作的基本特點。

問：妳對全球經濟或全球化的定義，好像跟別人有點不同，妳可否談一下你的定義為何，以及這個定義對我們理解當今世界有可幫助？

莎：全球經濟不應只是指日益增加的國際貿易及投資，所謂全球經濟其實是指一個制度性的架構及機制的出現，內裡包含各種規範標準，包括會計、金融、生產等標準，這個架構及機制讓企業在全球每個地方營運，簡言之，全球化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架構或空間，當企業需要全球營運時，便需要走進去。

此外，事實上有許多不同類型的全球化，例如國際人權體制、環保團體、甚至是最近我們知道的全球恐怖主義團體。對企業來說，是標準規範，對人權來說，會是不一樣的東西。就以美國對阿富汗進行的戰爭攻擊為例，美國需要到處尋求國際盟



友，這次戰爭與針對伊拉克的波斯灣戰爭不同，美國現在更需要一個國際網絡，儘管它是一場戰爭，這裡所謂全球化就是指國家——即使是戰爭——也需要在全球網絡上運作。

問：全球化是否就是美國化？

莎：你可以說是，也可以說否。讓我們回到標準規範上討論，大部份規範標準都來自英國與美國，因此，你可以說在技術標準上是美國化，但是，我不會把全球化說成就是美國化，這比美國化來得複雜。現在，越來越多的國家加入全球經濟，而每一個國家有它獨特的行政體系、制度、政治機構，加入全球經濟就至少要把那些標準「翻譯」成自己語言，應用到自己國家的脈絡上，政治、經濟、媒體精英需要適應（adapt to）並運用（adopt）全球標準，因此部份精英變得「去國家化」（denationalized），在這裡我特別用這個詞，而不是用國際化（internationalized）；這遠比美國化來得複雜，就以常典型的美國化例子來討論好了，麥當勞常被認為是美國化的象徵，它來到台灣，也需要稍為調整，它的漢堡在台灣跟在美國都會不一樣。所以，這是一個混雜的過程，當中涉及英美化，但同時涉及不同地方的獨特處境。

問：全球經濟好像無遠弗屆，但為甚麼能稱得上具全球性的城市仍是高度集中在幾個地方？

莎：這個問題有點複雜。假設現在有一家公司，因為別的國家勞動力便宜需要在那兒設廠，就好像世界各地資本到中國大陸廣東省設廠一樣，或麥當勞到不同地方開分店一樣，本身是一個高度擴散的過程，負責中央指揮管理的部門如何處理這些龐大的經營網絡？工廠與分店越多，網絡越複雜。全球城市有各種混雜的資源、專業人材、基礎建設讓你處理這些複雜的網絡。一家在多國營運的公司需要處理許多不同種類及不同地方的會計制度、法律制度、廣告策略、公共關係等等，這是多麼複雜的事！而且，這些公司大概會向外購買這些服務，而不是多設立一些新部門，因此便形成了一個巨大的網絡，我想，台灣的公司到倫敦及紐約也會購買這些服務，事實上，這兩個城市大量向外輸出這些服務。所以，全球城市就好比一個平台，無論多麼複雜的服務，它都為你提供。

當我們想到全球組織架構時，其實往往是談到四十個全球城市，部份是真正的全球城市，部份是具有全球功能的城市，前者是真正的全球平台，它們掌控了全球經



濟，在最頂端的有五個，其中紐約及倫敦是最頂級的兩個，提供各類資本及服務，往下會有巴黎、法蘭克福、芝加哥、雪梨、布宜諾斯艾利斯、台北、曼谷等等，越往下，這些城市越是處理區域性的功能。

例如布宜諾斯艾利斯，如果你是一位想到阿根廷投資的投資者，你對當地一無所知，你便到這個城市來，它有法律、會計、傳播設施等等；同時，它也能處理一些與烏拉圭、巴拉圭相關的服務。我想，台北也會有處理周邊非台灣地區的服務，當然，台北的位置很特殊，它被幾個非常強大的經濟包圍：中國大陸、日本、東南亞等等，我不知道台北具體的運作如何。但是，台北也許會有一些高度集中的功能。我們應該把每個國家設想成一個龐大而且不易穿透的制度，內裡有行政、會計、法律等制度，例如當一家矽谷的公司進來，它需要在這個龐大的制度環境中打開一條通路，而那些專業服務便是為此而存在的。我對台北所知不多，但我對上海及北京知道較多，在北京，那裡有大量的律師事務所及會計公司，它們處理外資投資；香港也是如此，它處理中國與世界各地之間的經濟連繫。我想，台北與矽谷之間也許也有類似的連繫，或者還有別的是我不知道的。

具有全球功能，就是指你能處理及提供專業化的服務、管理能力、電訊傳播架構等等，因此，外資能在台灣營運，台資能在海外營運。我可以再舉一個例子說明一下，巴黎是一個全球城市，但它的法律制度與英美不同，因此，許多美國或英國法律及會計公司在那裡設立分公司，使巴黎與全球經濟接上。所以，這種現象不單發生在位階比較低的城市，在頂級的城市也在發生，這就是某些人所說的美國化。

但另一方面，全球城市為不同人提供機會互動，不論你是窮人還是有錢人，在全球城市中，會有來自五十個不同國家的人匯聚在一起，不同的人來自不同地方及文化，發現他們在一個地方上工作，這是我為甚麼用「去國家化」這個概念的原因。例如，在被炸毀的世貿中心裡，有五十九種不同國家菜式的餐廳，來自非洲、亞洲及拉丁美洲。對我來說，有一點非常重要，這裡出現了全球政治，它關於全球資本，也關於人民，例如，現在性工作者穿透每個國家。因此，你會得到一幅「去國家化」的圖像，內裡有企業，也有貧窮的移民，當你說「國際化」，你通常只談到那些精英階層，他們有能力在不同國家居住，到處流動，但移民不一樣，他們只是脫進了原來的國家，但卻居於一個新的環境中，這就是為甚麼我會稱之為「非全球政治」（non-cosmopolitan politics），即既是跨出原有國界的，但卻又是在地的。



問：最近紐約發生的 911 恐怖主義襲擊事件震撼全球，妳認為對於全球城市有甚麼意涵？

莎：全球城市的核心，例如紐約的曼哈頓地區，是一個非常具有策略性的地方。作為社會科學家，我們很少機會去做實驗去證明我們的看法，當然，對我個人來說，世貿中心被炸死了這麼多人，是一場悲劇，但是，另外有一點是非常重要的，事件發生後，美元匯價下跌，全球金融市場下跌，紐約股票交易市場休市四天，星期一復市便下跌七百點，跌得相當嚴重，之後的兩天也分別跌了兩百點及三百點，我想問的問題是：只是一小塊地方及一些建築被炸毀，為甚麼全球金融市場對此反應如此激烈？金融市場是一個電子化市場，並不是現金交易，這次襲擊並不是把數十億計的美元燒掉，為甚麼世貿中心及周邊地方的物質性（physicality）對全球金融市場影響如此巨大？曼哈頓是全球經濟系統的大腦的一部份，這是一個不停進行交易的系統，而大腦負責組織及管理這些交易，當 911 事件癱瘓了曼哈頓區後，雖然沒有癱瘓整個大腦，但也癱瘓了大腦的一個部份。

在四十個全球城市中，單以金融交易來說，便呈現出一幅高度集中的圖像，特別是集中在紐約。對社會科學家來說，這好比一次實驗，測試出這個大腦部份有多重要。當然，我這裡只是討論功能，而不是人命，這是一場悲劇，許多人死去，事實上，很多在曼哈頓區工作的是低薪工人而非高收入人士，而從死傷者的分佈來看，可以看到紐約的職業及收入的兩極化。

現在的問題是，下一步會發生甚麼？事實上，許多企業及建築物在那裡是因為慣性，例如高文沙斯（Goldman Sachs），人們稱它為華爾街的校園（campus），它聘用了超過一萬人，許多人根本不用在那裡，他們可以遷到其他地方，例如郊區，但是當中的二千人左右，作為大腦的重要功能，還是要在紐約華爾街的，現在高文沙斯及摩根（J P Morgan）離開紐約，到新澤西或康迺狄克州去，一部份人不會回來，但最頂端的還是會回來的，他們需要高度集中的環境及資訊，並隨時貼近最新消息。

問：既然資訊科技這麼發達，為甚麼全球經濟還需要全球城市？

莎：我在書中有談到聚集（agglomeration）的效應，我解釋過，為甚麼在辦公室電子化後，仍然需要像華爾街一樣的高度集中的商業中心，我在這裡無法進入細節進行討論，但這裡有兩個基本元素。第一點，為了極大化技術連繫的優勢，企業需要社會連繫，需要一群人混在一起，讓他們互動，你在世界各地有專家，但你需要讓他們



匯集在一起，這就是爲甚麼上海在這方面無法與香港競爭，香港是一個真正具大腦功能的都市，那裡有各種專才及社會連繫；第二點，在資訊年代裡，我們往往忘記了有兩類資訊，一類是標準化的，無論多複雜還是可以克服距離的，例如你要進行股票買賣，即使你在偏遠山區，只要有通訊設備，便能到華爾街的市場去進行交易；但是，第二種資訊並不一樣，但也是重要的，它是各種標準化資訊的混合，市場是不確定及投機性的，因此，需要把標準化資訊與非標準化資訊結合，因此便會碰到人的經驗、才能、估價、專業意見、猜想、推論等等，在華爾街或矽谷，其實都不只是在生產及交易，而是創新發明，空間的密度讓兩個過程同時發生，這就是技術連繫與社會連繫發生作用，社會連繫的好處並不是視訊會議可以取代的，而且資訊也不是標準化的，例如，法律與金融服務。

我對 911 事件的解讀是，對標準化的東西影響不大，它們本來就不需要在那裡，過去只是因爲慣性而已，恐怖主義襲擊打破了這種慣性，但企業仍需要獲得競爭優勢，需要把領導性的部門設在那裡，華爾街仍然是全球經濟的大腦，同時，我想，也許還會有新的經濟部門在那裡出現，例如創新性的媒介企業，因爲它們需要社會連繫。

問：最近在台灣興起一片「上海熱」，也有很多人擔心台北無法與上海競爭，妳對上海的發展的甚麼看法？妳認爲它與台北的關係又應該是甚麼？

莎：我剛在上海完成了一個大型計劃，有一隊研究員在那裡做研究，這個計劃其實不只包括上海，還有杜拜、貝魯特、墨西哥城、布宜諾斯艾利斯、香港等城市，都是關於全球城市與網絡。我們在上海做了許多工作，這本書將會於 2002 年 3 月出版，名爲《全球網絡，連結城市》（*Global networks, Linked Cities*）。上海市政府在基礎設施方面的工作普遍受到各方贊賞，他們有很好的地下鐵系統，有很好的數碼傳播系統，同時，他們也重新奪回「過去」，營造出一種城市經驗，但他們缺乏香港的社會連繫。我個人並不認爲上海會成爲另一個香港，上海與香港會一起合作，有功能上的分工，其中金融市場中的最複雜部份仍會集中在香港，而歐美及亞洲其他國家的資本要進入中國大陸，仍然是一個頗複雜的過程，香港在這裡仍有優勢；而上海有的是其他，它是一個主要的工業及港口綜合區域，那裡有巨大的經濟活動在發生，當然，還會有部份金融活動轉移到上海。紐約與上海不一樣，紐約已沒有製造業了，只具有大腦功能，香港也一樣，與此相比，上海是特別的。



我對台北認識不多，不過我想，城市之間需要合作，產生合能（synergy），形成全球城市區域。台北接近上海，有多大可能讓上海與台北合作，是值得思考的問題，台灣是一個小國，但是，在過去二十年的過程裡，它還是發展出一些功能上的優勢，台北應該想一想怎樣與別人合作，而不是競爭。我不是在說上海－台北－香港的三角關係，我想，香港大概對這沒有興趣，我想到的是香港－上海、台北－上海，當然，這只是猜想而矣。這關乎到台北有甚麼專業功能是上海沒有的，上海是一個標準化的經濟（standardized economy），台北可能有一些專業化服務，例如創新發明能力，是上海沒有的，也許台北沒有香港這麼多專業化服務，但可能還是有一定專業優勢（specialized advantage）。

我知道有五十萬台灣人住在上海，很多是年青人，當國民黨撤到台灣時，也有許多上海人來到台灣，因此，台北應該與上海有許多連繫，這些資源如何轉化成合作？全球經濟是一個高度專業化的網絡，就好像矽谷，不是任何產業都在那裡，只是一些專業化部門，到底甚麼是台北的專業化服務？甚麼專業化服務能讓台北定位在全球經濟上？與上海之間互補的可能在哪裡？我要說的是，擺脫競爭的想法，堅持要與別人競爭往往會帶來很大的破壞。

問：在你的文章中，妳曾認為全球化對女性帶來解放的力量，並突顯她們的問題，這種看法會否過於樂觀？

莎：我是否樂觀？你可說是，也可以說是否。女性當然是受盡剝削，但我想，全球化中具有一定的解放力量，不過，它當然是以間接的方式表現出來，全球化動搖各種層級制度、特權及權力，這當中包括國族國家的男性與精英權力，這為各其他行動者出現創造了機會，國際關係在以往被國家支配，而且都是男性的工作。女性能參與國際關係事務通常只限於非政府組織，但是國際體系的重要性現在被減弱了，而非政府組織則日益耀眼，表現突出，她們原來是被國家制度排斥所以才高度集中在非政府組織，現在反而能在國際關係中扮演重要角色，這可以說是一個諷刺。另外，儘管女性往往是廉價勞工，卻因此受到資本家的歡迎，但當她們變成勞工後，她們在家裡獲得更多的權力與自主，在紐約這樣的全球城市中，大部份工人都是女性，她們得到工作是因為她們是廉價勞工，但她們人數眾多，卻能使女性的問題得以突出。



問：移民在全球城市中十分突出，妳認為是甚麼緣故？

莎：當我於八十年代末在東京做研究時，我與很多日本人聊天，我問他們，日本有沒有移民，他們都說沒有，並堅持這是東京跟紐約不一樣的地方。當時我住在東京，有兩件很有趣的事，第一，東京像倫敦與紐約或其他全球城市一樣，在社會底層有許多遊民，部份是由於城市的縉紳化（gentrification）被趕到街頭去，我在東京乘搭列車時常會迷路，偶爾會發現遊民，當中部份是移民；此外，我也會走進餐廳的廚房去，發現許多非日本人，他們來自中國大陸、韓國、泰國、印度、巴基斯坦。到底天下間有沒有社會制度可以把移民完全摒諸門外？我想是不可能的，當東京與全球經濟融合時，東京也會「非國家化」，也會有低收入的移民勞工。移民的數目在全世界是與日俱增的，這與全球化很有關係，全球化為資本搭起橋樑，但當橋樑建好後，便會由其他人來使用：移民、妓女、走私、恐怖分子、毒販等等；此外，全球化是與城市有關的，「去國家化」使資金與人群流動，當中有低下階層，也有高層精英，產生出來的效果也有好有壞。

問：不少討論全球化的論者，都指出將出現一種新的治理（governance）系統，妳認為它有甚麼新特點？又帶來甚麼新挑戰與可能性？

莎：全球化意即國家制度部份地去規管化，並且也涉及私營化，即是說，外來投資者有更多資產可以購買，若你去巴西與阿根廷，你會看到不少企業原來由政府擁有，現在也被私人企業買下來，這在世界各地到處發生，私營化與去規管化意味著政府在經濟的角色減弱；此外，金融市場更易躲開國家的控制，雖然企業私營化及解除規管，但治理還是需要的。只要看一看俄羅斯的例子便可知道，那裡有一個非常殘酷的去規管化過程，並引起大災難，而投資者並不會拯救俄羅斯。同時，若我們回到剛才談到的標準規範的問題上，我們發現政府角色仍然重要，政府必需跟從這些標準，而大部份標準是美國化的，這就是我們稱之為美國化的過程，但這只是故事的一部份。

另一部份是與國際體系（interstate system）有關的。例如世界貿易組織，它是不受民主問責制度監督的，在問責制度中有政府與人民，但是，現在全球市場與公司掌控了大量資源，甚至可以把一個國家拖進金融危機之中，市民要求更多的監督與參與，但政府仍然受到很大的壓力去推行新自由（neo-liberal）計劃。在治理方面，我們今天面臨一個非常嚴重的議題，除了上面談到的壞影響外，也有好的，例如國際



人權體制比以前強大，全球媒體把一個人被國家侵害的事件化成全球事件，我們亦有全球環保團體。

但是，全球經濟是一個高度不平等的分配制度，你可能也知道，紐約的曼哈頓地區掌控了全球金融交易量的一半，我們亦有全球恐怖主義者作為去國家化的力量，在全球有很多不同的行動者。我不是一位樂觀主義者，但我相信行動，我想，仍然有很多可能性讓人民、網絡、資源動員起來，在全球制度中要求更多的民主，雖然來自市場與企業的要求可能更多。我一直都認為，爭取民主的公民與非政府組織，可以在現有的制度中體認到自己的力量，恐怖主義者告訴我們，你可以影響全球制度，他們把紐約一小片地方炸毀，便產生巨大力量，所有全球城市與網絡是全球經濟的大腦，不要以為全球經濟是萬能的，能流動到任何地方，它只是集中在為數眾多的企業與少數幾個重要市場。雖然有全球經濟架構，但也有全球架構讓民主與反抗力量能以發揮與擴散，若我們談到人，移民回到他們國家或自己的群體中去，形成團結力量，這本身也是全球化的一部份。人們常以為我們面對全球企業無能為力，但事實上，人民是有空間形成全球力量。對人權分子來說，他們跟全球企業一樣能利用全球媒體，這是一個複雜的地景，並開展出更多的民主實踐。

